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 …… 王芸生 曹谷冰(1)
“万木草堂”回忆……梁启勋(62)
简述“哈佛燕京学社” ……聂崇岐(70)
桐油买办商义瑞行的经营始末 ……李景文(81)
陈纳德所办的民用航空公司 ……徐国懋(134)
奉张时期和日伪时期的东北兵工厂 ……陈修和(150)
云南空军始末 ……张汝汉(166)
我与广东空军 ……丁纪徐(193)
我所知道的孔祥熙 ……谭　光(213)

附注

对«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六〇页

对«“万木草堂”回忆»一文的质疑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二六页

对«云南空军始末»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六〇页

对«我所知道的孔祥熙»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七二页

China

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

关于旧大公报的历史，我們曾經将自从英敛之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創刊这个报，到王郅隆及其后人手里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的一段，統称为"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作为前段整理过了。現在继續談的是吳鼎昌、胡政之、张季鸞三人經营时期的旧大公报。这是后段。这一段历史，是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天津續刊，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后于六月十七日在上海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共約二十三年的历史。

1926—1949

吳鼎昌、胡政之、张季鸞三人經营的新記公司大公报，是从安福系財閥王郅隆的后人手中购买过来，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天津原址（日本租界四面钟对过，現和平路二四一号）續刊，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在上海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告这个报归人民所有，旧大公报的历史从此結束。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二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年代，它包括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爭（即大革命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爭（即土地革命战爭）、抗日战爭、第三次国内革命战爭（即中国人民解放战爭）四个重要时期。这不太长的二十三年，在中国人

China

民革命斗爭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从鴉片战爭起，斗爭了一百多年，經过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直到这一时期才涌起波瀾壯闊的革命高潮，以至取得一九四九年的大解放。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級已經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强大到担任起領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同时，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也已經长大起来，能够在政治上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了。这二十三年，在中国現代史上恰恰記載着代表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蔣介石統治集团由叛变大革命篡夺国家統治权到最后崩潰，同时記載着以工人阶級为領导（經过中国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結中小資产阶級即民族資产阶級的民族統一战綫的反复斗爭，以至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这是中国两种社会力量的斗爭，即以蔣介石集团为首的中国大資产阶級的力量同中国无产阶級及其先鋒队所領导的力量的斗爭。同时也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爭。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所說：中国之命运有两种："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說，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国，就是說，一个老中国。"① 蔣介石集团对内代表中国的大地主大資产阶級，对外依靠国际帝国主义，所以它的斗爭如果成功，中国必然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中国。中国人民革命，交叉着阶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阶級斗爭是經常进行着的；但是，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阶級矛盾就呈現一定程度的緩和，以至形成无产阶級同資产阶級之間某种程度的合作。不仅如此，中国人民革命的統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版第一〇四八頁。

一战綫，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爭时期和抗日战爭时期还曾經先后两次把蔣介石所代表的大資产阶級組織在統一战綫之內，蔣介石也先后两次叛变了革命。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是在同中国資产阶級的复杂关联中走过来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旧大公报是官僚資本企业，主持者吳鼎昌、胡政之、张季鸞三个人都是大資产阶級的大知識分子。报紙既然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上面的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組成部分，它就必然为一定的阶級利益服务。这一时期的这个报，立場明确，始終是为大資产阶級的利益服务的。由于中国革命走着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这一时期的旧大公报也就如影随形地反映着中国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种曲折复杂的形态。而总的方向是：蔣介石依靠美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反人民，旧大公报拥护蔣介石，直到蔣政权的灭亡。

这大致可以画成如下的一幅曲綫图：

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新記公司大公报續刊之初，正当北伐軍逼近武汉，大革命达到高潮，这个报就反映出資产阶級对于大革命的恐惧。它怕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怕工农学生的群众运动的兴起，一句話是怕"赤化"。它要蔣介石表明究竟是"赤化"还是"非赤化"的政策态度。頂到蔣介石叛变了大革命，民族統一战綫破裂了，大公报不怕了，吳鼎昌这个大官僚大銀行家就千方百計地向蔣介石統治集团里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蔣介石不抵抗失掉东北三省。蔣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根源于他的反共反人民的路綫。全国人民憤怒地要求蔣介石抗日，蔣介石利用大公报替他的不抵抗政策辯护，又把吳鼎昌拉进他的所謂"国防設計委員会"，以为"准备抗战"的点綴，实际却在全力进行所謂"攘外必先安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內”的反共內战。以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为轉机，蔣介石被迫承諾了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思想进入了国民党統治区，大公报只是抱着热烈拥蔣統一的心情，并未认眞領会或宣传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民主、团結、进步的精神。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的炮声响了，以至“八一三”淞沪抗战起来，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間的民族矛盾已經成为主要矛盾，大公报才打出“拥护抗战”的旗帜。蔣介石的抗战原是不得已而为之，自从一九三七年起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蔣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秘密謀和活动始終沒有停止，张季鸞就部分地参加了这种活动。在八年抗战中，大公报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貪污腐化进行了一些“小罵”，对于蔣介石“統一軍令政令”的叫囂和几次反共阴謀进行了“大帮忙”。因为大公报对蔣政府“帮忙”有功，在抗日战爭将近胜利的时候，胡政之向蔣介石敲了二十万美元官价外汇的竹杠。一九四五年抗日战爭胜利以后，国际和国內的阶級关系都起了重大变化，蔣介石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結，表面上摆出一种和平姿态，实际上积极准备反共反人民的內战。这时候，胡政之以所謂“社会賢达”① 的身分参加了旧政协和所謂“第三方面”，周旋于国共之間；大公报也維持着“第三方面”的姿态。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蔣介石正式揭开反共反人民的內战之幕，是蔣介石的再一次叛变。胡政之到南京签名报到参加了伪国大，“第三方面”破产了；大公报的領导层在这时已經看出蔣介石的失敗的命运，而由于它的阶級的規律，大公报也就撕掉了所謂“独立”、“自由”、“第三者”等等的紗幕，走着崇美随蔣的末路。中国共产党領导的中国人民解

① “社会賢达”这个名詞，是由政学系头子张群創造出来的，是指参加旧政协的无党派人士，如王云五、傅斯年、胡政之等都被称为“社会賢达”。

放战争一天天地胜利，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的反人民内战一天天地失败，美帝国主义也知道蒋介石的大势已去，难于挽救了；但为了最后保留它的中国半殖民地，还寄幻想于中国的所謂“民主个人主义者”。在这时候，所謂“第三条道路”喧騰起来，一些受过西方資本主义文化的教育和影响、或多或少带有买办性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也在他們沒落阶級的掙扎中仰望着美帝国主义的“青睞”。馬歇尔和司徒雷登都重視大公报，因而也把胡政之作为网罗的对象。胡政之的看法比美帝国主义眞切些，他判断蒋政权終将灭亡，所以他于一九四八年三月恢复了大公报香港版，在此以前，他还在美国出版了一个《大公报紐約双周》①，这是他为他自己和大公报准备的退路，准备在中国解放之后流亡海外以至到美国去办“白华”大公报。代表中国大資产阶級的一个重要报館的老板胡政之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即上海解放前一个月死去了，大公报即在上海解放之后結束了它为中国反动的大資产阶級服务的旧历史，归人民所有，获得了光荣的新生。

吳胡張三人

吳鼎昌、胡政之、张季鸞三个人，同出身于官僚地主資产阶級，同是中国大資产阶級的大知識分子。他們三人少年时在日本同学，后来共同經营新記公司大公报。旧大公报前后共有四十七年的历史，吳胡张經营的一段約二十三年，約占旧大公报历史的一半，而其重要性却远远超过前段。这是因为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一段历史时期重要了，也因为旧大公报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所代表

① 这个《大公报紐約双周》的內容，是把每两周內的大公报的重要社評譯成英文发表，由于时局变化，发行不久即停刊。

China

的阶級性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有着曲折复杂的关系，这个报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发生了或多或少或浅或深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旧大公报的資本很单純，主要是吳鼎昌的五万元，这是官僚資本。吳鼎昌的資本，胡政之的組織，张季鸞的文章，这是构成新記公司大公报的三要素。这里先談吳胡张三人的略史。

吳鼎昌

吳鼎昌，字达詮，笔名前溪，一八八四年生于四川华阳。吳原籍浙江吳兴。吳家世代当"师爷"，他的父亲吳贊廷在四川綏定府署作幕十七年之久，退休后即定居成都作寓公，在成都置有田宅。吳鼎昌出身于官僚地主資产阶級，少年进学为华阳县秀才，入成都客籍学堂讀书，获得四川官費留学日本。先在日本东京預备学堂修业，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吳工于心計，矢志作官，在日本留学时，正当辛亥前革命高潮时期，他挂名为同盟会員，并不革命，一般同学在課余时間从事政治活动或娛乐，他却閉門练写小楷，准备回国考洋翰林。回国应廷試，果然得中翰林院检討。經其族伯山西藩台吳匡涛举荐給东三省总督錫良，先任东三省总督署度支、交涉两司顧問，后派充中日合办的本溪湖矿务局总办。后来又以大清銀行总监督叶景葵的关系，被任为大清銀行总务局局长，轉任大清銀行江西省分行监督。辛亥革命时，吳逃出江西，适成立大清銀行清理处，吳参与了接收上海大清銀行的事务，又参与了中国銀行的筹备事务。吳先与研究系拉上关系，一九一三年熊希齡組閣，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任吳为造币厂监督。吳又与梁士詒拉上关系，梁为袁世凱的总統府秘书长，将吳引荐袁世凱，袁未予重用，只給一个参議的空名。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搞洪宪帝制，任吳为

China

农商次长，未就任。一九一七年张勋搞复辟运动，河南督軍张鎮芳附逆，复辟事平，张鎮芳連带垮台。盐业銀行系张鎮芳所創办，自任董事长兼总經理，吳与张鎮芳有联系，张在政治上垮了台，恐影响他的銀行，請吳出来頂名担当盐业銀行的事务；吳这时已与安福系发生关系，段祺瑞任內閣总理，梁启超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遂令吳鼎昌接收盐业銀行，他从此担任了盐业銀行的总經理。一九一八年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約吳任财政次长，吳允为次长，但要求兼任天津造币厂厂长。吳两度任造币厂厂长，共七、八年之久。因造币厂向日本购銅，得回佣；鑄造銀元的成色检驗标准有伸縮，譬如国际标准为百分之八十八，得有千分之三的上下，北洋政府的标准为百分之九十，但含銀至百分之八十的銀元就敲得响了，吳因此发了财。吳在财政次长任內，适逢上海焚毁鴉片大舞弊案，财政部受賄八十万元。曹汝霖兼任总长，部务俱由吳鼎昌处理，这笔賄款，曹未分潤，由吳独得①。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吳为北方分代表之一。当时安福系当政，吳鼎昌实系安福系的代表，安福系不願和，吳为代表，参与謀議，起了部分破坏作用，和議无成。一九二二年，吳鼎昌发起由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銀行創办"四行儲蓄会"，并設"四行准备庫"，为中南銀行取得鈔票发行权。四行儲蓄会的領导机构由四人組成，即盐业代表吳鼎昌、金城代表周作民、中南代表胡笔江、大陆代表談丹崖，推吳为主任，就此形成所謂"北四行"的集团。一九二六年吳鼎昌投資五万元，与胡政之、张季鸞接办天津大公报，吳为社长。

在此以前，吳鼎昌曾經对人說，他准备办三件事：(一)开一个

---

① 据章士釗委員对作者說，这件事是吳鼎昌亲自告訴他的。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报館。他說一般的报館办不好，主要因为資本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貼，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他計划拿五万元开一个报館，准备賠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請一位总經理和一位总編輯，每人月薪三百元，預备好这两个人的三年薪水，叫他們不兼其他职务，不拿其他的錢。一九二六年他接办大公报，就是一次拿出五万元，以胡政之为总經理，张季鸞为总編輯，每人月薪三百元，相約专心办报，不兼他职。新記公司大公报就这样办了二十多年，直到中国解放。(二)办一个儲蓄会，以抵制外国人办的儲蓄会。这就是四行儲蓄会。这件事是成功的，四行儲蓄会吸收存款最多时逾一亿元。外国人办的万国儲蓄会和中法儲蓄会被四行儲蓄会挤垮了。(三)設一个国际大旅社，免得外国人来到中国都住洋飯店。这就是四行投資的上海国际飯店。这三件事他都做了，特别是大公报使他得到鉆进蔣介石集团的一份政治資本。

吳鼎昌是个典型的官僚資产阶級官僚政客，一生做官，一直到死。他从束着小辮子讀书的时候就想做官，得秀才，留学日本，考洋翰林，走他族伯的門径开始做官；他通过叶景葵的門径鉆进大清銀行；拉上研究系的关系，因此抓到造币厂这个肥缺，嘗到"升官发财"的滋味。他是个条陈专家，由清末到民初，他不断地給大官上条陈，以兜售他的心計，博得梁士詒的賞識。梁士詒把他引見袁世凱，袁世凱相他"背后見腮"，不予重用，只給了个参議。吳自己曾說他吃了相貌的亏。其实，袁世凱当时嫌他曾經挂名为同盟会員，經过考察，其人并不革命，所以到洪宪帝制时袁世凱对人說："現在可以用他了。"給吳鼎昌一个农商次长，吳一嫌这个官不大，也看到袁皇帝的风头不順，未曾下水。接下来，他从研究系鉆进了安福系，由此抓到了盐业銀行，成为銀行界的重要人物；由此做了财政

China

次长再兼造币厂长，眞正发了财。吳鼎昌的鉆进安福系，也还靠了他的賭博本領。他同安福系一些头子倪嗣冲、吳光新等一起打牌，混得很亲热。吳能計算，善于賭博，很贏了一些錢，他在北戴河的一所别墅就是打牌贏来的。到一九二六年，在他投資接办大公报的前夕，安福系倒了，整个的北洋軍閥也就要土崩瓦解了。在这时候，这个热心做官的吳鼎昌什么官都沒有了，只剩下一个盐业銀行总經理作他的基础。这时候，南方的新兴势力起来了，划时代的大革命开始了，北伐也就要出师了。吳鼎昌是善观气象的，他观察到他所立足的北洋軍閥集团的气数尽了，必須面向南方，另靠新主。这时他的留日同学胡政之正在搞国聞通信社和《国聞周报》，这两个新聞出版企业都不得劲，經济困难，吳鼎昌每月津貼国聞周报三、四百元，以資維持。吳鼎昌經常以"前溪"的笔名在国聞周报上发表文章，借以买得一个"經济专家"的名气。当然，那时每周只发行几千份的国聞周报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这时适逢张季鸞失业在天津閑居，吳鼎昌在天津当他的盐业銀行总經理，胡政之在王郅隆的旧大公报关門后，在北京办国聞通信社，也常来天津走走。这三个当年的留日同学，又在日本租界相会，看着双門紧閉的大公报館，就动了接办大公报的念头。张季鸞正无事可干，技痒难熬；胡政之的国聞通信社和国聞周报都病懨懨地沒有起色，对在自己手上办垮了的旧大公报也不甘心；吳鼎昌原有拿五万块錢办报的計划，这时正在无官寡居，大为寂寞，也願意借胡张两个熟手办起一张报来，作为自己再挤上政治舞台的政治資本，于是一談就"三人同心"了。吳鼎昌拿出五万元，由胡政之从王郅隆的儿子王景珩的手上盘购了旧大公报館，以胡政之的班底（国聞通信社和国聞周报的干部以及旧大公报的职工），加上张季鸞的一支笔，組成

China

了新記公司大公报，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續刊。

新記公司旧大公报續刊之日，正值北伐軍与吳佩孚軍大战于汀泗桥，武汉摇摇欲墜。吳鼎昌这个拥有資財的投机政客，身在将傾的北方旧巢，面向陌生的汹涌而起的南方新兴势力，心旌悬悬，不知如何对待。他采取了积极态度，因为有大公报这个武器在手，他就活跃地利用起来。新記公司旧大公报九月一日續刊，九月二日的报上就发表吳鼎昌写的署名"前溪"的題为《战卜》的論評。这篇文章是吳鼎昌的問路石，对南北两方且不作左右袒，只表示象似厌战的意思。随后看出革命营垒里有裂縫可寻，更由于他自己的阶級性的指使，他就接連着写《注意国內与国际之变化》、《注意两大潜势力之暴发》等篇社評，向讀者指点北伐軍有"赤俄为之扶持，有青年为之宣传，国际势力之竞爭"等等，从而挑拨"赤化"与"反赤化"之国际关系。等到看定了形势，蔣介石确有叛变革命的迹象了，他就在九月十九日出版的第三卷第三十六期国聞周报上发表署名"前溪"的社論，題目是《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蔣介石宣明态度》，儼然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資产阶級要蔣介石表明他的政策是"赤化"还是"非赤化"。也就是要蔣介石表明他是忠实于与工农群众結成統一战綫的大革命呢，还是象旧軍閥一样继續作城市买办資产阶級和乡村豪紳地主阶級的代理人？蔣介石果然叛变了大革命，大举屠杀工农人民，成为效忠于大地主大資产阶級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新軍閥。一場惊天动地的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叛徒蔣介石所篡夺，建成了代表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反动政权。吳鼎昌这个官僚資产阶級政客自然是霧然色喜，弹冠相庆，又"可以出而仕矣"。怎么鉆进蔣介石的营垒，自然还要靠大公报这个武器。一九二七年一月，他在国聞周报上发表《中国新經济政策》一篇专文，并且印了单行本

China

分寄各方，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經济学者”，以搔首弄姿，插标卖身。顶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民族危机严重了，吳鼎昌搞政治活动的机会来了。他抓住“国难当头，废止內战”这个題目，于一九三二年五月間在上海策动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銀行公会、錢业公会四团体，发起一个“废止內战大同盟”，这个大同盟的章程十条，就是吳所起草；发表通电，署名者都是上海的“閒人”，工商界巨头多在其中，吳鼎昌也在其中。吳鼎昌策动发起这个“废止內战大同盟”，固然看准了人們願望和平害怕战爭的心理，而在他个人却是“手揮五絃，目送飞鴻”，嘴里喊“废止內战”，眼睛却向蔣介石送秋波。他所起草的废止內战大同盟的十条章程，开宗明义便說：“鉴于外患內忧之严重，特发起废止內战大同盟，以期安內对外。”这个“安內对外”到蔣介石那里就变成“攘外必先安內”了。在这个大同盟成立以前，吳鼎昌于五月十七日在上海地方維持会发表演讲說：“国內民生状况已朝不保夕，若再有內战促其崩溃，必回演历史上之惨剧，赤眉、黃巢、张献忠、李自成往事不难再出現于全国。”这显然是指的中国共产党所領导的工农紅軍对蔣介石“剿共”的抵抗。六月九日吳又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演“废止內战大同盟”，并将讲稿在国聞周报上发表，宣传这个运动是由他策动、发起、組織起来的，以显示他在中国資产阶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九一八”事变的民族危机，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到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重大压力，蔣介石一方面需要比較有力量的报紙替他的不抵抗政策辯护，另一方面也需要搞些花样作为他准备抗日的点綴。为了前一种需要，蔣介石叫于右任給张季鸞打电报，要大公报主张“緩抗”，以应付全国各方面，特别是青年学生請願抗日的怒潮，大公报的确为此大卖了力气。为了后一种需要，蔣介

China

石在南京政府之下組織了一个所謂"国防設計委員会"，网罗各方面的有名人士参加，以为点綴。在金融界方面，錢昌照給蔣介石开了个三人名单：吳鼎昌、徐新六和张嘉璈。在此以前，张季鸞曾經在蔣介石面前揄揚过吳鼎昌，蔣此刻为了需要，自然加以延攬。这年夏天，蔣約吳在牯岭見面，連續談了一星期，对吳大为賞識。从此，吳鼎昌跨进了蔣介石政权的門檻。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不但牢牢稳占了东北四省，并且已經显示它要向关內前进了，它要占領全中国。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了。蔣介石为了继續欺騙人民，准备組織一个以他自己为行政院长的"名流內閣"，內定以吳鼎昌为实业部长。先于这年十月間　由吳鼎昌糾合平津沪汉金融工商界首脑人物，組織了一个"赴日經济考察团"到日本去搞所謂"中日經济提携"。这个考察团一行共有三十四人，团长为吳鼎昌，团員有陈光甫、俞佐庭、周作民、黄文植、刘鴻生、徐新六、唐寿民、錢永銘、宋汉章、鄒敏初、钟鍚、胡筠庵、黄江泉、南經庸、祝士刚等。从这个团的組織成員来看，吳鼎昌儼然已取得当时金融工商界領袖的地位。吳鼎昌从日本回国不久，即于这年十二月坐上南京政府实业部长的交椅。吳鼎昌同蔣介石政府的关系从此升堂入室了，这在吳鼎昌算是如願以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爭爆发，国民党政府由南京撤退到武汉，吳鼎昌即轉任貴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綏靖副主任。当他在貴州期間，閑暇时在貴阳花溪飲酒賦詩、有的时候穿着上将的戎装向国民党軍官和部队"訓話"　是他作官很"写意"而过癮的时候。一九四五年被調到重庆当蔣介石的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了蔣的幕僚，他小心翼翼地伺候蔣介石。这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对日抗战的历史阶段过去了，作为中国大地主大資产阶級政治代表

China

的蒋介石，他紧紧勾結着美国帝国主义，一面急着搶受降，以搶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一面加紧准备内战，以遂他灭共統一的野心。蒋介石原是坐待胜利的。一旦胜利突然到来，使他一切措手不及。他需要时間。搶夺胜利果实需要时間，准备反共内战更需要时間。吳鼎昌向蒋介石献策了，他要蒋介石装出一副和平姿态，邀請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計"。他預料毛主席不会到重庆去。如果毛主席不到重庆去，国民党可以借此宣传是共产党不願意談和平；如果毛主席去了，蒋介石也可以利用国共談判的时間搶受降，調兵遣将，准备内战。蒋介石采納了吳鼎昌这个計策，即令吳起草了一个"寒电"，于八月十四日拍往延安。吳于十五日晨把电稿交給大公报，要在当天的《大公晚报》上发表这个独占的大新聞。稿子发排后，被新聞检查所扣住了。該所請示"侍从室"，陈布雷說"絕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謠"。原来象这样的重要文电，向由陈布雷經手，而这次却由吳鼎昌献策并經手发出。結果这項新聞大公晚报未能搶先，而是由"中央社"統一发稿，十六日同見各报。毛主席于十六日答复了蒋介石的电报，朱德总司令同日也給蒋介石一个电报，向蒋介石政府提出六項严正要求①。蒋介石又于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两次电邀毛主席去重庆，美国駐重庆大使赫尔利还在八月二十七日为此到了延安。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爭取和平，也为了在爭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眞面目，以利于团結和教育广大人民，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于八月二十八日由延安飞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談判。毛主席等到了重庆，可是国民党方面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中国

① 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一四二頁。

China

共产党方面提出①。这就因为蒋介石本来沒有和平的誠意，只是由于吳鼎昌的献策，而且預料毛主席不会去，所以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电报邀請，对于和平談判却毫无准备。一九四五年九月吳鼎昌一度兼任中央設計局秘书长。頂到蒋介石悍然揭开反人民的內战之幕，南京伪国民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四月选举蒋介石为伪总統，吳鼎昌被任为伪"总統府秘书长"。以吳鼎昌的"聰明"，他已經知道蒋家天下快完了，很想摆脫不干，而又不敢，深自慨叹业已"不能下船"了。那时他感到这样一种恐怖：他如果要坚决不干，蒋就会把他的身家性命干掉。他在这年年底在大公报上登出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新記公司的董事，是他的善后布置之一。頂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結束了，蒋軍五十五万五千多人被歼灭了，蒋介石的伪总統干不下去而宣告"引退"了，李宗仁代理伪总統了，吳鼎昌才乘机辞掉这个伪"总統府秘书长"的官銜，背着人民判决的第十七名头等战爭罪犯的罪名，溜到香港作寓公。吳鼎昌一生热中于作官生活，机謀策画，慣作幕后勾当，用尽聰明手段，以求名利双收，到头来却以战爭罪犯結束了他一生的作官生涯。吳鼎昌在溜到香港以前，就把他的"动产"变为黃金美鈔逃汇国外，預备做个白华闊佬。可是他的生命将尽了，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病死于香港，年六十六岁。

胡政之

胡霖，字政之，笔名冷观，一八八九年生于四川成都。他的父亲胡登崧，是甲午科(一八九四年)举人，捐官知县，在安徽省作官，

---

① 参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一五八頁。

China

先代理天长县知县，一九〇六年死于五河县知县任内，在成都有祖遗田地。胡政之在八岁时随父到安徽讀书，先入私塾，后入安庆安徽省高等学堂。十七岁丧父，自費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日本大学学法律，一九一一年回国。一九一二年先任上海大共和日报日文翻譯，又參加了于右任、张季鸞等在上海創設的民立图书公司；同时在上海与友人合組一个"衡平律师团"，执行律师业务；旋至清江浦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任刑庭庭长，时間俱不久。一九一三年胡任上海《大共和日报》总編輯，兼任中国公学法律教員。一九一五年王揖唐任吉林巡按使，胡为秘书长；一九一六年王調任段祺瑞內閣的內务总长，胡又任內务部參事。胡政之由此同安福系发生了关系。就在这一年的九月，英敏之把他所經营的大公报盘售給安福系財閥王郅隆；王郅隆接办时，以胡政之为經理兼总編輯。这时期的大公报是安福系的机关报，胡政之进大公报也由于安福系的关系。一九一七年安福系首領段祺瑞討伐张勛复辟时，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宣传得有声有色。据胡政之自己說："张勛复辟之役，本报言論紀事，翕合人心，銷路大涨，一时有辛亥年上海民立报之目。"① 一九一八年欧洲大战結束，胡政之得到王揖唐的資助，代表大公报采訪了一九一九年举行的巴黎和会，是巴黎和会中唯一的中国記者。巴黎和会后，他继續留欧，游历了英、德、意大利、瑞士等国，于一九二〇年回国。这时正当直皖之战爆发，安福系失败了，大公报也萎靡不振，他离开大公报，到林白水主持的北京《新社会报》任总編輯。后因与林白水意見不合，离开新社会报，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在上海开办国聞通訊社。这个通訊社是以"民間新聞

① 見胡政之在紀念张季鸞逝世两周年时写的《回首一十七年》，載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大公报上海版。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